臺大歷史學報第 39 期
2007 年 6 月，頁 77~106

BIBLID1012-8514(2007)39p.77-106
2007.4.30 收稿，2007.6.5 通過刊登

全球化的省思
——全漢昇與近代中國經濟史研究

陳 慈 玉*

提 要

全漢昇先生獻身於中國經濟史研究逾六十年，他的學術貢獻深受同道重視推崇。他畢生孜孜不息，從 1930 年代開始篳路藍縷，窮研史料，挖掘新問題，開拓新領域；並且不斷地吸取西方經濟史研究的新觀念與新成果，同時盡心提攜後進，可說他以一己之力帶動了中國經濟史研究的新風氣，開拓了新視野，提昇了研究水準。回顧二十世紀此學術領域的發展，他的耕耘足跡歷歷在目。

固然他在長達六十多年的學術生涯中，研究重心有所不同，但治學態度始終如一，並且有其連貫性。如果以他所研究的時代來劃分的話，民國三十八年（1949）以前，他的研究範圍上溯漢末，下及元代，而以唐宋經濟史為主；此年以後專注於明清近代經濟的探討。如以他工作的地點來觀察，則 1949~1965 年主要是在臺灣，1965~1995 年在香港任教。他所研究的議題包括貨幣經濟、物價、財政、城市、經濟組織、交通運輸、國內商業、國際貿易以及近代工業化等，綿長遼闊，成果豐碩。全漢昇登上歷史研究的舞臺時，適值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的興起並走向黃金時代，當時學界展開了 1920 年代末期到 1930 年代的中國社會史論戰。他以踏實嚴謹的態度研究唐宋經濟史，指出漢末以後到唐代中葉以前的中古時期很明顯地可自成一個段落，與此時期以前及以後是不同階段的社會，此點有力地反駁了社會停滯論者。而在全球化議題發燒的今日，我們重新檢視他對近代中國經濟史的貢獻，發現到他的國際貿易與工業化研究是下意識地省思此現象，就此意義而言，其研究可說具有前瞻性。

關鍵詞：全漢昇　中國經濟史　中央研究院　國際貿易　工業化　全球化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前言
二、學術生涯
三、近代中國工業化研究
四、明清國際貿易研究
五、結語

一、前言

全漢昇（1911~2001）先生獻身於中國經濟史研究逾六十年，他的學術貢獻深受同道重視推崇。他畢生孜孜不息，從 1930 年代開始篳路藍縷，窮研史料，挖掘新問題，開拓新領域；並且不斷地吸取西方經濟史研究的新觀念與新成果，同時盡心提攜後進，可說他以一己之力帶動了中國經濟史研究的新風氣，開拓了新視野，提昇了研究水準。回顧二十世紀此學術領域的發展，他的耕耘足跡歷歷在目。

固然他在長達六十多年的學術生涯中，研究重心有所不同，但治學態度始終如一，並且有其連貫性。如果以他所研究的時代來劃分的話，民國三十八年（1949）以前，他的研究範圍上溯漢末，下及元代，而以唐宋經濟史為主；此年以後專注於明清近代經濟的探討。如以他工作的地點來觀察，則 1949~1965 年主要是在臺灣，1965~1995 年在香港任教。他所研究的議題包括貨幣經濟、物價、財政、城市、經濟組織、交通運輸、國內商業、國際貿易以及近代工業化等，綿長遼闊，成果豐碩。[1]他

1 關於他的生平事蹟，可參考王業鍵，〈全漢昇在中國經濟史研究上的重要貢獻〉，原刊登於《食貨》月刊復刊 14 卷 11、12 期（1985，臺北），1~14；修訂版收入全漢昇教授九秩榮慶祝壽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薪火集：傳統與近代變遷中的中國經濟：全漢昇教授九秩榮慶祝壽論文集》（臺北：稻鄉出版社，2001），597~616。黎志剛、林桑祿訪問，〈全漢昇院士〉，《漢學研究通訊》5 卷 1 期（1986，臺北），12~15；李木妙，〈全漢昇〉，《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2 期（1986，臺北），53~68；全漢昇，〈回首來時路〉，《古今論衡》1（1998，臺北），81~85；何漢威，〈代序：經濟史壇祭酒全漢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登上歷史研究的舞臺時，適值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的興起並走向黃金時代。當國民革命軍北伐前後，不少知識分子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來分析當時中國的社會結構與經濟關係情況，以期指引革命的進程，他們認為中國社會從戰國時期以後就處於沒有明顯變動的停滯狀態，因此展開了 1920 年代末期到 1930 年代的中國社會史論戰。一些學者則開始注意到中國社會經濟層面的複雜性，實非簡單化的理論所能表達，於是專心收集研讀史料，撰寫學術論著。梁庚堯認為全漢昇深受陶希聖和傅斯年的影響，以踏實嚴謹的態度研究唐宋經濟史，指出漢末以後到唐代中葉以前的中古時期很明顯地可自成一個段落，與此時期以前及以後是不同階段的社會，此點有力地反駁了社會停滯論者。[2]而在全球化議題發燒的今日，我們重新檢視他對近代中國經濟史的貢獻，發現到他的國際貿易與工業化研究是下意識地省思此現象。

本文以他隨時間的流轉與工作地點的改變（因為這是影響他關懷工業化和國際貿易的主要因素），所鑽研的議題為主，先介紹其學術生涯，再就工業化與國際貿易方面，探討他對近代中國經濟史的主要貢獻。

二、學術生涯

全先生的中國經濟史研究生涯大致可以分為三個時期。他在 1935 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因陳受頤主任的推薦，得以進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3]大學時期，他已經開始其研究生涯的第一階段，他

昇先生傳略〉，《薪火集：傳統與近代變遷中的中國經濟》，I~IV；何漢威，〈全漢昇與中國經濟史研究〉，《中國經濟史研究》2002 年 3 期（北京），146~149；何漢威，〈全漢昇先生事略〉，《香港中國近代史學報》2 期（2004，香港），185~189；梁庚堯，〈歷史未停滯：從中國社會史分期論爭看全漢昇的唐宋經濟史研究〉，《臺大歷史學報》35 期（2005，臺北），1~53。

2 梁庚堯，〈歷史未停滯：從中國社會史分期論爭看全漢昇的唐宋經濟史研究〉，《臺大歷史學報》35 期，1。

3 全漢昇，〈回首來時路〉，《古今論衡》1，8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當時深受政治系陶希聖教授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史學系傅斯年教授的影響。前者講授中國社會經濟史，全先生跨系修讀，對之極具興趣，感到這門學問亟待開發的新領域甚多，遂決定以此為終生志業。後者治學求博求深，教導學生認真蒐羅史料，不尚空言，這種務實求真的治學態度，日後遂成為全先生的治學方針。他的中古經濟史研究可以說是陶希聖與傅斯年兩位師長學風的結合，其研究成果指出，漢末以後到唐代中葉以前的中古時期很明顯地可自成一個段落，與此時期以前及以後是不同階段的社會，[4]此看法強力地反駁了當時中國社會史論戰中的長期停滯論。[5]

他在北大時期由於陶希聖先生的鼓勵，出版了《中國行會制度史》一書外，[6]並積極地撰稿發表於當時社會經濟史主要論壇《食貨半月刊》、《嶺南學報》等學術期刊，曾寫過十篇有關唐宋歷史與清代中西文化關係的論文。[7]進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之後，除了勤學英文，[8]即遵照傅斯年先生的囑咐，從宋代的商業著手，閉門讀書，專心找資料，擴大史料收集範圍，專門研究唐宋經濟史，[9]到 1948 年為止，總共發表過十七種論文與專書。[10]他主要探討的課題有：都市與鄉村的市場活動、

4 全漢昇，〈中古自然經濟〉，原刊登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0（1942，四川），後收入氏著，《中國經濟史研究》（香港：新亞研究所，1976），上冊，141。

5 何漢威，〈代序：經濟史壇祭酒全漢昇先生傳略〉，《薪火集：傳統與近代變遷中的中國經濟》，I；梁庚堯，〈歷史未停滯：從中國社會史分期論爭看全漢昇的唐宋經濟史研究〉，《臺大歷史學報》35 期，1、33~36。

6 他曾經謙虛地表示此書僅為習作，見全漢昇，〈回首來時路〉，《古今論衡》1，83。

7 全漢昇，〈回首來時路〉，《古今論衡》1，82。著作的時間根據本文最後所附的「全漢昇先生著作目錄」；其中，發表在《嶺南學報》的兩篇論文係由陳受頤主任所推薦，見何漢威，〈全漢昇先生事略〉，《香港中國近代史學報》2 期，185。

8 據全先生同事石璋如院士的回憶，1935 年 7 月底他抵達南京，與那廉君、丁聲樹、全漢昇同住，「丁、那兩位先生住在大房子，全漢昇先生不住大房子，因為住大房子裡，晚上聊天不易入睡，他又正在用功背英文字典，所以他獨居在大房子旁邊的小房子」。見陳存恭、陳仲玉、任育德訪問，任育德紀錄，《石璋如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114、115。

9 全漢昇，〈回首來時路〉，《古今論衡》1，82。

10 梁庚堯，〈歷史未停滯：從中國社會史分期論爭看全漢昇的唐宋經濟史研究〉，《臺大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有別於一般商人的工商業者（例如官吏之私營商業、寺院所經營的工商業）、區域之間的商品流通、長期物價的變動、中古時期從貨幣經濟到自然經濟再回歸貨幣經濟的演變等方面。[11]

當時他除了探討北宋首都汴梁（開封）和南宋首都杭州（臨安）的商業發展外，並注意到揚州和廣州在國內外貿易中所扮演的角色。他認為交通運輸的便利是促進此不同性質的四個城市（基本上，汴梁與杭州屬於行政功能色彩比較濃厚的城市，揚州是國內商業重鎮，而廣州是國際貿易商埠）得以繁榮的一重要因素，並且揚州、汴梁與杭州都位在運河沿岸。[12]所以他進一步思索連結唐宋時期經濟重心的南方和軍事政治重心的北方的大運河之重要性，完成了《唐宋帝國與運河》一書，根據史實分析運河的暢通與否和唐宋國運盛衰的關係。

另一方面，或許是由於戰時經濟不穩定的現狀，使他注意到貨幣和物價變動問題，不料，三十歲出頭的經驗與體會卻成為他畢生心血所灌注的課題。在〈中古自然經濟〉一文中，他受到德國歷史學派經濟學權威希爾德龐（Bruno Hildebrand）啟發，試圖從貨幣制度解釋中國經濟發展的內涵。他發現，從漢末魏晉南北朝時期直到唐代中葉（約自公元二世紀至八世紀中葉），自然經濟在中國較佔優勢，[13]實物貨幣取代金屬貨幣成為人們交易、納稅、地租和工資支付的主要手段。他利用馬克思（Karl Marx，1818~1883）的《資本論》（*Capital: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的理論，說明此與人類歷史發展——從自然經濟演變到貨幣經濟——相悖現象之所以出現的主因，是商業的衰退導致錢幣的需求量減少；也就是說，自漢末到隋初，戰爭的結果導致人口銳減、土地荒蕪、交通中斷和商業衰落，自然降低了對錢幣的需求。亦即當交易的目的僅是為了取得自己所需的物品，對貨幣需求量不大時，交易過程是：C（自

歷史學報》35 期，38；並參見本文附錄「全漢昇先生著作目錄」。

11 梁庚堯，〈歷史未停滯：從中國社會史分期論爭看全漢昇的唐宋經濟史研究〉，《臺大歷史學報》35 期，39~46。

12 王業鍵，〈全漢昇在中國經濟史研究上的重要貢獻〉，《薪火集：傳統與近代變遷中的中國經濟》，600~602。

13 全漢昇，〈中古自然經濟〉，《中國經濟史研究》，上冊，4、14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己所餘貨物）——M（貨幣）——C（自己所需貨物）；而當交易頻繁時，專業的商人取代消費者從事商貿，貨幣需求因此增加，交易過程乃轉變為：M（作為自己資本的貨幣）——C（貨物）——M（含有利潤的貨幣）。所以漢末以後商業因戰亂的影響而衰落，貨幣的使用自然相應退步。[14]同時，在供給方面，當時銅的產量大減和佛教寺院的廣鑄銅像，使貨幣的主要材料（銅）之供給缺乏。此後，經過貞觀和開元之治的太平盛世，商業得以發展，幣材的生產亦增加，所以金屬貨幣再度取得支配地位。[15]

對貨幣制度的興趣驅使他把研究的時間向後延伸到清代，探討自金屬貨幣演變到信用貨幣的過程，以及從信用貨幣再回歸到金屬貨幣的因素。他發現在南宋和元代紙幣的發行與流通，發展程序大致都經過價值穩定、溫和通貨膨脹和惡性通貨膨脹三個階段；而紙幣之所以不穩定的重要因素都是戰爭，由於軍事支出龐大，稅收不足，只好以通貨膨脹政策來彌補財政赤字。[16]此歷史事實幾乎與烽火下的經濟實況相似，也隱約可以看出現實政治情勢演變過程中，人們感到最切身相關的經濟生活的一面。[17]

1949 年來臺以後，他雖然陸續開始近代中國工業化和國際貿易的探討（第三、四節將述），也未放棄對貨幣和物價史的研究。1954 年，中英文版的《臺灣之城市與工業》一書問世後，全先生有機會重遊哈佛大學（當年和臺灣大學商學系楊樹人教授、哲學系殷海光教授一起受邀出國半年），閱讀近代西方殖民史的書籍，與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教授論學，啟迪他開始思考東西方經濟交流與互動的歷史證據。他發現西班牙經營下的美洲白銀影響到明末以後的中國財政與經濟生活。1955 年，全先生接受胡適先生的建議，經過歐洲回國後，由於王業鍵先生在史語所的協助，他乃能進一步利用史語所庋藏的各種資料，探究清代物價。據此了解到十八世紀的物價有長期上昇的趨勢，這種上昇趨勢和當

14 全漢昇，〈中古自然經濟〉，《中國經濟史研究》，上冊，9~10。

15 全漢昇，〈中古自然經濟〉，《中國經濟史研究》，上冊，13，137~138。

16 王業鍵，〈全漢昇在中國經濟史研究上的重要貢獻〉，《薪火集：傳統與近代變遷中的中國經濟》，604~605。

17 全漢昇，〈回首來時路〉，《古今論衡》1，82~8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時美洲白銀的大量進口有莫大的關係，而美洲白銀之所以大量進口是為了交換中國絲貨。不僅如此，當時各地區間糧價高低不一，於是價格較低的長江中上游地區的米糧，經長江水路運到價格較高的下游和東南沿海銷售；長江下游生產的棉布和過剩的人口，則流入中上游一帶，造成中國境內的經濟交流和人口移動。結果內地農業資源得以開發，解決東南沿海糧食不足的危機。他的研究顯示，清代民間「已經具有一個自由的米糧市場；……清朝政府雖然力圖以官運、倉儲和糴糶等方式來影響米價，但明顯地從未直接干預市場機能的自由運作」。[18]

後來，王先生利用經濟發展和貨幣學的理論，配合兩岸故宮博物院所典藏的珍貴檔案，將研究範圍拓展到全中國和整個清代的開發中區域與已開發區域的貿易、人口流動和物價波動等，修正史堅雅（G. William Skinner）的區域理論，對近代中國經濟史的研究貢獻很大，讓全先生非常地欣慰。[19]近幾年來，隨著清代原始檔案的陸續開放與整理，以及電腦數位技術的進步，資料遠比 1950~1960 年代全先生著手探討時豐富方便，不但擴大了研究的時空範圍與影響物價的因素分析（例如氣候循環、天災等）；除此之外，中外學者也能運用較嚴謹的統計學方法來處理數據，解釋很多歷史現象，使清代經濟史（尤其是物價史）研究得以更上一層樓。飲水思源，不能忘懷全先生的開山之辛勞與卓越成就。[20]

三、近代中國工業化研究

全先生的學術生命在 1944 年面臨轉折。該年他蒙傅斯年和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陶孟和兩位所長的提拔，獲派到美國哈佛、哥倫比亞、和芝加哥等三所著名學府進修，從 Abbott P. Usher 、Shepherd B. Clough、

18 Han-sheng Chuan and Richard A. Kraus, *Mid-Ch'ing Rice Markets and Trade: An Essay in Price History* (Cambridge, Mass.: 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 Harvard University), 1975, 6-7；何漢威，〈全漢昇與中國經濟史研究〉，《中國經濟史研究》2002 年 3 期，148。

19 全漢昇，〈回首來時路〉，《古今論衡》1，84~85。

20 何漢威，〈全漢昇與中國經濟史研究〉，《中國經濟史研究》2002 年 3 期，14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John U. Nef 等經濟史大師，汲取西洋經濟史學界的新觀念、新方法與新成果，並且與西方經濟史學家建立聯繫管道，奠定日後中西學術交流的基礎。[21]其中，John U. Nef 的 *The Rise of the British Coal Industry* 一書，詳細地分析英國煤礦業的興起與當地交通運輸、資本、技術等因素的關係，亦論及煤礦業及其相連結的鋼鐵業在英國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所扮演的舉足輕重角色。他當時深受此書的啟發，又覺得日本於明治維新以後，短短七十年的經濟發展，即能稱霸東方，威脅強雄的美英兩先進國，究其因素，工業化乃是日本踏上侵略亞洲之途的動力。並且他遠離貧困的家園，親身體驗美國富庶的物質文明，不免感慨萬分；所以開始推敲近代中國工業化遲緩的問題，[22]並以〈唐宋政府歲入與貨幣經濟的關係〉（1948）一文，為其中古史研究劃下中止符。

來臺灣以後，他一方面從漢陽鐵廠著手，鑽研近代中國工業化問題。另方面在《社會科學論叢》（國立臺灣大學法學院）、《財政經濟月刊》等期刊為文，論述西方先進國家的工業化、日本與二戰前後遠東的經濟，以及臺灣的工業化問題。[23]他已經開始注意到當時臺灣工業化的程度較大陸進步甚多，他認為這種現象與二十世紀前半臺灣環境較中國安定，並未飽受大戰亂的摧殘（此為漢冶萍公司凋零的一大因素）息息相關。全先生並接受美援會的委託，與 Dr. Arthur F. Raper、臺灣大學社會系陳紹馨教授等人，率領一群臺大經濟系學生，針對臺灣的城市與工廠，做了詳盡的調查工作。這可以說是一向埋首於故紙、古書中的全先生，生平唯一的田野調查工作。1954 年，根據當時田野工作而以中英兩種語文出版《臺灣之城市與工業》（*Urban and Industrial Taiwan, Crowded and Resourceful*），這本書應有助於學界對日治後期和戰後初期臺灣經濟的了解。[24]

全先生以漢陽鐵廠為研究清末工業化問題的個案。他利用工業區位

---

21 全漢昇，〈回首來時路〉，《古今論衡》1，83；何漢威，〈全漢昇與中國經濟史研究〉，《中國經濟史研究》2002 年 3 期，147。

22 全漢昇，〈回首來時路〉，《古今論衡》1，83。

23 參見本文附錄「全漢昇先生著作目錄」。

24 全漢昇，〈回首來時路〉，《古今論衡》1，8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理論（Location Theory），注意到漢陽鐵廠的成功與否，和煤礦資源的地理位置之相關性、鐵路運輸的重要性，以及資本對報酬遞減的礦業的影響力。由於漢陽鐵廠從 1904 年開始，即根據合約，將所產鐵砂出售給日本八幡製鐵所，所以日本很早就垂涎中國的煤、鐵礦，終於利用大量貸款給中國而控制了漢冶萍公司。其實，除了該公司外，他已經注意到二十世紀初期以後，日本逐漸強化對中國煤鐵礦資源的投資，所能掌握的煤礦（例如撫順煤礦、山東魯大煤礦公司等）產量，在二戰前約佔中國煤產總量的八成。若加上「在華紡」（日本在中國所設立的棉紡紗工廠）等輕工業，日本資本在中國工業化過程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日本除了類似以貸款來投資漢冶萍公司的模式外，還運用更積極的直接控股的做法（預買煤炭 ⟶ 承包開採 ⟶ 中日出資合辦）。由於他當時不易蒐集到日文資料，因此對此領域的研究約在 1961 年左右即告一段落。[25]

他之所以研究漢陽鐵廠和漢冶萍公司，固然是由於 John U. Nef 著作的啟迪，但也因為他已經深刻地體會到煤礦資源及工業化都與當時的全球化現象息息相關。他曾經指出，在液體燃料和氣體燃料尚未出現或普及之前，煤炭是最主要的工業燃料，和交通運輸工具（鐵路、輪船）的原動力，亦為工業化的指標之一，故可稱為文明之泉源。而 1920 年代末，世界動力的 75.1%來自煤，17.3%來自石油，水力的比重則為 7.6%。[26]

此外，他更論述到世界上國家經濟發展的程度所以有懸殊，工業化的成功與否是其中一個最重要的關鍵。工業化成功的國家因使用機械而消費的動力非常龐大，所以需要豐富的動力資源。雖然世界六大洲的動力資源蘊藏量，以北美洲為最大；但如以每方公里平均的動力資源蘊藏量來說，則以歐洲為最大。這也就是北美洲和歐洲近百年來是工業化速度最快、成績最好的因素之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的 1938 年，美、英、德三國的工業產值約佔世界總額的 50%以上。而在亞洲，就每方公

25 全漢昇，〈回首來時路〉，《古今論衡》1，83~84。

26 A. P. Usher, "The Resource Requirements of an Industrial Economy,"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Supplement VII (1947, Wilmington)；全漢昇，〈山西煤礦資源與近代中國工業化的關係〉，原刊登於《中央研究院院刊》3（臺北：中央研究院，1956），後收入氏著，《中國經濟史論叢》（香港：新亞研究所，1972），冊 2，74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里平均的動力資源蘊藏量來說，以中國為最豐富，日本次之，朝鮮又次之。日本所以能夠工業化，除利用其國內動力資源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前，曾經長期利用中國東北和朝鮮的動力資源，當為其中一個重要因素。在 1935 年，中國的動力產額僅佔全世界的 1.622%，其資源蘊藏量卻佔 24.898%，可說是世界上動力消耗與動力資源的比例最懸殊的國家。因為中國擁有豐沛的動力資源，當將來大量開發時，可能要因工業化而在世界經濟中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27]

他也比較各種動力資源，利用西方的調查資料指出：在各種和工業化有關的動力資源中，煤是最重要的一種。據專家估計，其蘊藏量佔 83.6%，石油佔 0.45%，水力則有 15.95%。工業革命以後，隨著機械動力的大規模使用，煤在工業生產中一躍而居最重要的地位。煤是體積重量太大而價值太小的物品；並且煤在生產過程中又會失去重量（即當工業產品製造出來時，煤的重量便告消失），所以英國雖然不出產棉花，但在鄰近煤礦所在地興辦棉紡織業，從美國、西印度群島、巴西、埃及、印度等地輸入大量的棉花作原料，發展棉紡織業，自十八世紀下半以後，擁有最廣大的國際市場。[28]至於重工業方面，世界上重要鋼鐵工業中心，除建立在煤鐵集中在一起的產地外，在煤礦地帶遠多於鐵砂產區，以減少運輸成本（因為煤的體積、重量龐大，運輸費遠高於鐵砂）。例如，自十八、十九世紀以來，瑞典和西班牙的鐵砂多運往煤產豐富的英國和德國煉製；法國因煤產缺乏，其鐵砂多運到德國；在德國薩爾（Saar）出產的鐵砂多運至魯爾（Ruhr）流域冶煉，因為後者是重要產煤區域。在美國，匹茲堡（Pittsburg）是世界著名的鋼鐵工業中心，因為其四周是重要煤田所在地，但所用的鐵砂則需遠從蘇比利亞湖（Lake Superior, 今譯蘇必略湖）畔運達。[29]

---

27 全漢昇，〈世界動力資源與世界工業化〉，《財政經濟月刊》1 卷 2 期（1951，臺北），55~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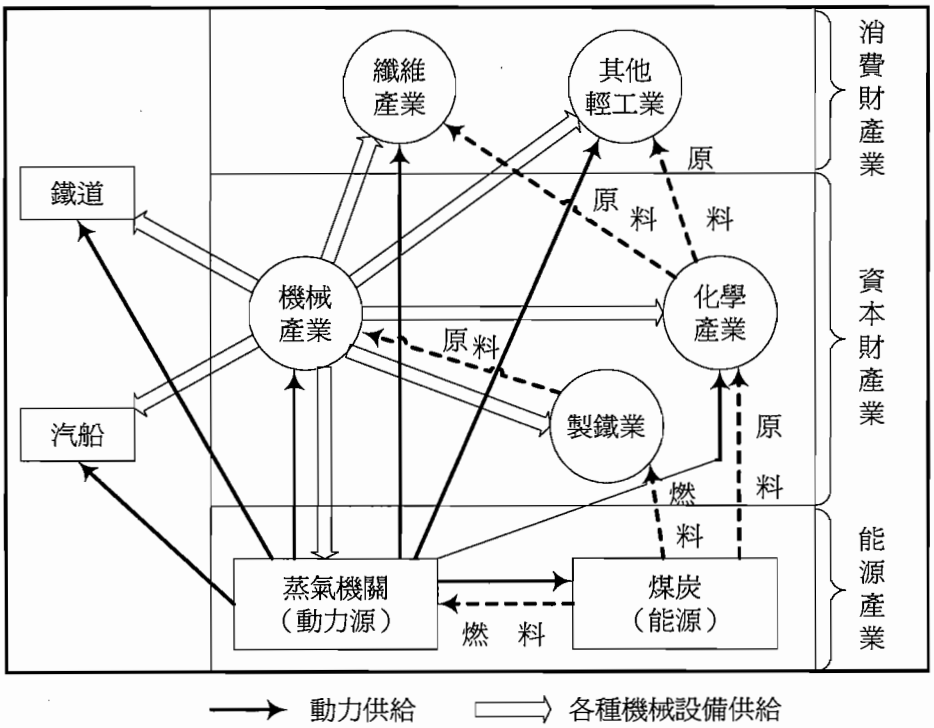
28 全漢昇，〈煤、水力、石油在近代機械動力上的地位〉，《財政經濟月刊》1 卷 1 期（1950，臺北），48~53。

29 全漢昇，〈清末漢陽鐵廠〉，原刊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21（1948，北平），後收入氏著，《中國經濟史研究》，下冊，150~15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其實，全先生所專究的煤鐵礦資源，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期與其他產業的關聯可圖示如下：

二十世紀初期煤鐵礦資源與其他產業結構圖



資料來源：J. M. Gaillard / A. Lespagnol, *Les mutations économiques et sociales au XIX^e siècle, 1780-1880* (Nathan, Paris: Nathan université, 1984); 轉引自：〔日〕福井憲彥，《ヨーロッパ近代の社会史：工業化と国民形成》（東京：岩波書店，2005），27。

易言之，作為重要能源的煤炭是支撐製鐵業和棉紡織業等工業發展的要素，而製鐵業又與機械產業息息相關，後者則提供一切工業器材和交通設備，煤炭同時也是交通工具的主要原動力，因此是工業化的指標之一。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全先生認為近代中國工業化的成績，「是不滿意的，遠比不上其他國家」。[30]其因素有：沒有開發善用豐富的資源、資本累積困難、生產技術相對落後、「官辦」或「官督商辦」的企業組織的弊端（相較於西方民營工業），以及喪失關稅自主權等。[31]其中，喪失關稅自主權，就「不能提高關稅稅率以保護本國剛建立起來的幼稚工業；故外國工業品大量進口，與本國工業競爭，於是本國的工業買賣不好，常常虧本」。[32]這可以說是以全球化的視野所提出的觀點。因此他的漢冶萍公司、鐵路建設研究等，都以具體史料來印證上述導致近代中國工業化不理想的因素。例如，他指出造成清季資本蓄積困難的重要原因有：國民儲蓄的微薄、信用機關的不健全，和對外戰敗的賠款負擔等。[33]

資本和技術人才的缺乏確實是後進國家經濟發展的主要障礙，技術人才的培養則有賴教育（王業鍵先生認為當時政府並沒有積極投資教育），[34]可以從國外引進技術，進行技術移轉。一般而言，技術移轉是經由技術的供給者與接受者雙方（企業或政府）互相配合才能實現。兩者之間的能力、政策或技術差距的大小，都會影響到所移轉的技術知識之質與量，而且供給者的介入角度、接受者的自主性的程度亦不一，因此產生多種技術移轉的模式。日本學者內田星美根據歷史事實和現代國際技術移轉的方式，把技術移轉的模式大致分為十一類：（1）供給國直接在海外投資設廠；（2）來自供給國的移民之創業；（3）合資事業；（4）委託供給技術者經營；（5）當供給者建廠時訂定契約保證技術移

30 全漢昇，〈近代中國的工業化〉，原是 1966 年在新亞書院的演講；後收入氏著，《中國經濟史研究》，下冊，17。這些國家包括英、法、德、美、義大利和日本等國。

31 全漢昇，〈近代中國的工業化〉，《中國經濟史研究》，下冊，18~21。

32 全漢昇，〈近代中國的工業化〉，《中國經濟史研究》，下冊，21。

33 全漢昇，〈清季鐵路建設的資本問題〉，原刊登於《社會科學論叢》4（1953，臺北），後收入氏著，《中國經濟史研究》，下冊，235~243。關於這些論點的補充，可參考王業鍵，〈全漢昇在中國經濟史研究上的重要貢獻〉，《薪火集：傳統與近代變遷中的中國經濟》，614~616；何漢威，〈全漢昇與中國經濟史研究〉，《中國經濟史研究》2002 年 3 期，149。

34 王業鍵，〈全漢昇在中國經濟史研究上的重要貢獻〉，《薪火集：傳統與近代變遷中的中國經濟》，615~61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轉；（6）接受者的企業雇用供給者所屬的工程師、熟練工；（7）買入機械及其 know how；（8）輸入機械和整體技術移轉；（9）專利實施權契約；（10）仿造；（11）自主技術開發。[35]而其順序是自高度依賴技術供給國逐漸至接受國的顯著自主。

當時漢冶萍公司的性質雖屬中日合資，所有主要技術來自日本，日本亦直接派遣工程師等技術人員駐廠，但在不平等的合同下，根本無法從日本轉移技術。加上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的政治與社會並不安寧，戰亂頻仍，當然有礙工業的發展，更不能發揮 Alexander Gershenkron 所說的後進工業國借用先進國的最新技術而出發的有利性。[36]何況此有利性是存在於歐美各國之間，因為他們擁有共同的文化傳統，可以經由企業家、熟練工的移民、歸化等方式來移轉技術，異質文化的中國、日本與歐美之間就不太可能以移民為媒介。

四、明清國際貿易研究

1961 年 9 月，全先生辭去中央研究院代總幹事一職（1957 年底，總統任命胡適為院長，胡氏尚未回國前由當時史語所李濟所長暫代院長，聘請全先生擔任代總幹事，1958 年 4 月胡適就任院長，全先生依然擔任此行政職務），[37]第三度到美國，以兩年的時間先後在芝加哥大學、[38]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和哈佛大學訪問。當時他看到了 1903~1909 年間在美國克里夫蘭（Cleveland）出版的《1493~1898 年的菲律賓群島》（*The*

35 〔日〕內田星美，〈技術移轉〉，收入西川俊作、阿部武司編，《產業化の時代》（東京：岩波書店，1990），上冊，260~261。

36 Alexander Gershenkron, *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8.

37 陳存恭、陳仲玉、任育德訪問，任育德紀錄，《石璋如先生訪問紀錄》，374~375、377。

38 根據全先生的日記（未公開），他早在 1961 年春間就收到芝加哥大學的邀請函，但因為胡適院長 2 月 25 日晚上心臟病發，「口吐了些血」，住在臺大醫院，所以他直到 5、6 月才向胡院長提及此事。由於待遇優渥，胡院長不得不答應他辭總幹事職，並要全夫人「可剩幾個錢回來，好彌補彌補生活之需」。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Philippine Islands, 1493-1898）。這一重要史料，開啟了他從中國、菲律賓、西班牙的三角貿易關係來析論美洲白銀與中國絲貨貿易的研究之門。[39]1965 年 11 月，全先生到香港後，[40]身處國際貿易明珠，更深深感受到十六世紀以來東西經濟交流在中國經濟史上的重要性。此後在香港三十載，他將中西貿易與明清時期的金屬貨幣制度（銀兩和銅錢兼充市場交易的媒介和支付的工具）相連結，從銀銅幣材的供給面思考，希企完成 30 歲以來的對中國貨幣史的體系化研究。[41]

眾所周知，絲和茶是近代中國主要的出口品。根據他的研究，在十六世紀新航路發現後，中國向西方世界大量輸出絲綢，開拓了海上絲綢之路。這指的是 1565 年開始中國絲綢運往西班牙殖民地的菲律賓，再轉運至美洲（墨西哥等地）的太平洋航道，以及將絲綢運往印度、歐洲的印度洋航道；另一方面，中國絲綢並被輸往日本，換取大量白銀，流入中國。

當時從事中西之間國際貿易的商人，有西班牙、葡萄牙、荷蘭和日本、中國商人，最多時，每年可以向海外輸出 10,000 擔左右的絲貨，和鴉片戰爭前夕 1836 年的 14,000 擔相媲美。西班牙絲織工業本來很發達，產品大量運銷西屬美洲，而中國絲織品價廉物美，故奪取了西班牙絲織品的美洲市場。換句話說，需求市場的擴大增加了中國絲織品的輸出。[42]

---

39 全漢昇，〈回首來時路〉，《古今論衡》1，85。又，1898 年美西戰爭後，美國取代西班牙，統治了菲律賓，為了瞭解過去西班牙 330 多年的殖民經驗，以為參考，乃由 E. H. Blair 和 J. A. Robertson 有系統地收集西班牙公私文獻，翻譯成英文，編輯為此套書籍，共 55 冊。因為中國商人早已前往菲律賓做生意，而西班牙勢力從其美洲殖民地擴伸到西太平洋的菲律賓後，與中國的貿易關係日益密切，故此套書在這方面有豐富的記載。參見何漢威，〈全漢昇與中國經濟史研究〉，《中國經濟史研究》2002 年 3 期，147。此外，全先生在 1963 年 3 月 21 日的日記中亦曾表示：「前天買到的書，*The Manila Galleon*，寫得很好，內容述西班牙如何在 17、8 世紀經營 Mexico 與 Manila 間的貿易，而中國當日絲的出口，構成貿易的重要因素。」按：*The Manila Galleon* (New York: E. P. Dutton, 1939)一書的作者是 William Lytle Schurz。

40 根據全先生的日記，他在 1965 年 11 月 9 日搭乘 JAL 班機離臺。

41 全漢昇，〈回首來時路〉，《古今論衡》1，85。

42 詳見本文附錄「全漢昇先生著作目錄」中的相關論文。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再者，和以往的研究一樣，全先生廣徵博引、網羅史料，他利用正史、詩、文集、筆記，以及中外檔案、書信、西方相關研究文獻等，進一步分析促成中、菲、西屬美洲之間的三角貿易的因素有：

（一）白銀在太平洋東西兩岸供需情況的不同（白銀的供需市場）：中國各地銀礦的蘊藏本來有限，經過長期開採，明朝中葉以後，各地銀礦漸漸耗竭，每年產量有長期遞減的趨勢。可是，明代的白銀在需求方面卻增加甚多。白銀在中國求過於供的結果，價值自然要特別增大。但是在太平洋彼岸的美洲，由於西班牙於十五、六世紀間抵達新大陸以後，在那裡發現儲藏豐富的銀礦，於是從事大規模開採，尤其是秘魯和墨西哥的銀礦，產量劇增，成為全世界生產白銀最多的地方。於是在菲律賓的西班牙人，因為有銀產豐富的西屬美洲做後盾，所以與視白銀為至寶的中國商人進行貿易的時候，購買力非常大。從而引起中國商人擴展中菲貿易的興趣，以便把西班牙自美洲運來的銀子，賺回中國使用。

（二）明代政府對於國外貿易管制的放寬（政府政策）：明初政府採取的國外貿易政策，以懷柔外國和防禦海寇——尤其是倭寇——為目的。因為要懷柔外國，所以在寧波、泉州和廣州設立「市舶提舉司」（市舶司），以管理外國使臣的朝貢和對外貿易。而十五、十六世紀之際，歐洲人開始東來，這些歐洲國家的商人，擁有堅強的組織和雄厚的資本，當然不像過去南洋諸國那樣肯屈就臣屬的地位，往往用武力強迫中國互市或勾引中國商人作內應來反亂。結果中國官方只好多開口岸來滿足他們通商的要求。到西班牙占領菲律賓二年後的 1567 年（隆慶元年），更進一步正式開放海禁。

（三）西班牙人統治菲律賓時對於中國貨物的倚賴（絲織品的供需市場）：西班牙占領菲律賓後，一方面必須經常防禦外來敵人（如葡萄牙、荷蘭）的侵襲，另一方面又須鎮壓各島原住民的叛亂，因此非常需要各種軍需品，可是菲律賓和他們在美洲的基地或歐洲的本國距離都很遠，接濟不易，故有賴於中國商人的輸入，以維護在菲律賓的西班牙殖民者的安全。且當時菲律賓生產落後，遠離本國的西班牙人，必須仰賴中國的糧食及其他生活必需品。此外，菲律賓資源有限，而且尚未開發，並沒有什麼重要產品可以由大帆船（galleon）大量運往美洲、歐洲出售

臺灣大學圖書館 期刊資料庫

獲利，因此中國往往是大帆船貿易貨物的主要來源。而最重要的商品就是絲綢，馬尼拉成為中國與墨西哥之間的轉運站。中國與菲律賓的貿易因此成為西班牙對世界貿易的重要一環。[43]

全先生並且進一步釐清了同時期中國與日本、葡萄牙、荷蘭等國的貿易關係，擴大了中國經濟史的視野。他有關明清時期中國國際貿易與金銀比價方面的論文多達 25 篇，可謂是他研究生涯後期最珍貴的結晶，也為後人開拓了新課題。

除了絲貨貿易外，全先生在晚年也研究中國與英國的茶葉貿易（幾乎是他的封筆之作）。[44]1717 年，茶取代絲成為中國輸出品的第一位，而 18 世紀，飲茶的習慣已流行於包括工人階級在內的英國家庭之中，英國東印度公司自中國購買茶出口到倫敦和利物浦，除了供給本國市場之外，再轉運到歐陸和美國，賺取巨大的利潤。在英法殖民地七年戰爭之後，英國成為世界商業界之主腦，而 1775~1776 年的美國獨立戰爭，1778 年的英法作戰，1779 年的英西之戰，1780 年的與荷蘭的戰爭，使英國逐漸孤立，亦使美洲新大陸的白銀供給中斷，而導致英國東印度公司因為購買資本之不足，乃不得不接受活躍在亞洲地區內的港腳商人（country traders）的補助；另一方面，一連串的戰爭使得英國財政陷入窘狀，只得提高茶稅。茶稅自從 1660 年以飲茶稅的名義創設以來，常常改訂（1689 年改為關稅），1768~1772 年，以從價換算是 64%，1773~1777 年平均為 106%，1778~1779 年平均為 100%，1783 年是 114%，1784 年則高達 119%。[45]

而中國茶雖為英國東印度公司貿易商品之大宗，但是數量卻不多，

---

43 詳見本文附錄「全漢昇先生著作目錄」中的相關論文。

44 全漢昇，〈鴉片戰爭前的中英茶葉貿易〉，原刊登於《新亞學報》17（1994，香港），237~255；後收入氏著，《中國近代經濟史論叢》（臺北：稻禾出版社，1996），217~233。

45 此段引用自 W. Milburn, *Oriental Commerce* (London: Black, Parry & Co., 1813), Vol. II, 542; E. H. Pritchard, "Anglo-Chinese Relations during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University of Illinois Studie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Vol. 17, Nos. 1-2(1929, Urbana), 146-147；〔日〕田中正俊，〈舊中國社會の解體と西歐資本主義〉，收入氏著，《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序說》（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3），123~12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例如 1772~1780 年的年平均中國茶輸出總量 18,838,140 磅中，經由英國東印度公司的船隻運輸至英國的只有 5,639,938 磅（佔 29.9%）；且以年平均消費量而言，歐洲大陸諸國最大限為 5,500,000 磅，英國和北美殖民地至少可當為 13,300,000 磅，在這需求與供給的不平衡，又由於稅率高，使得茶價高漲之時（當時英國茶價約為荷蘭的三倍），歐洲大陸剩餘的 7,698,202 磅，乃經由走私貿易而流入英國。[46]此時，在英格蘭的茶商有 34,076 人，在蘇格蘭則有 956 人，[47]而其中大約有 100 位大資本商人獨占著合法貿易（這些人大部分在倫敦），他們的業務與利潤因為走私貿易而減損。所以為了增加正規茶之貿易量，降低茶價，並防止茶稅收入的減少，而且賦予英國東印度公司與歐陸諸國的東印度公司之競爭能力，英國政府乃在 1784 年實施減稅法（Commutation Act），把從價約 120%的茶稅大幅減至 12.5%。[48]

英國政府大幅度降低茶的輸入關稅後，中國茶的輸出量於是飛躍地增加。銀作為交換手段，在十八世紀後半，每年約有 500 多萬兩流入中國，也就是說，對英國而言，當時是入超貿易，有巨額的逆差。為了平衡貿易，東印度公司於是拓展印度和中國的貿易，把印度的鴉片和棉花運到中國，其數量漸增。因此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英國對中國的入超貿易轉變為出超貿易，中國白銀開始流出，[49]並且形成了中國（茶、

46 全漢昇，〈鴉片戰爭前的中英茶葉貿易〉，《中國近代經濟史論叢》，222；田中正俊，〈舊中國社會の解體と西歐資本主義〉，《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序說》，124。

47 Hoh-Cheung & Lorna H. Mui, "The Commutation Act and the Tea Trade in Britai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 16, No. 2(1963, Oxford), 244.

48 George B. Staunton, *An Authentic Account of an Embassy from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 to the Emperor of China* (London: Nicol, 1798), Vol. 3, 474; Appendix VI; E. H. Pritchard, "The Crucial Years of Early Anglo-Chinese Relations 1750-1800," *Research Studies of the State College of Washington*, Vol. 4, Nos. 3-4 (Washington: Pullman, 1936), 146 ff.；〔日〕波多野善大，〈中國輸出茶の生產構造——アヘン戰爭前における——〉，收入氏著，《中國近代手工業史の研究》（京都：東洋史研究會，1961），91~93。

49 全漢昇，〈鴉片戰爭前的中英茶葉貿易〉，《中國近代經濟史論叢》，222~231；M. Greenberg, *British Trade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1800-4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1), 13-15; 有關中國白銀之流出總額，參見嚴中平編，《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生絲、白銀）⟶英國（棉布）⟶印度（鴉片、棉花）⟶中國之間的三角貿易。[50]此現象引起了中國國內空前的銀價騰貴的現象，進一步打擊已因私鑄錢之激增而相當敗壞的中國通貨制度，嚴重地影響了中國的經濟體制。

從他的論文中，可以看出他依然試圖從白銀的流通面（對中國而言，是供給的減少）來探討全球化籠罩下的中國茶葉貿易的重要性。

另一方面，全先生於 1967 年和 1971 年先後在香港的《新亞學報》和臺北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分別發表〈宋明間白銀購買力的變動及其原因〉和〈自宋至明政府歲出入中錢銀比例的變動〉兩篇學術論文，他經由論述白銀成為貨幣的過程，連結了早期的唐宋經濟史研究，和晚期的明清經濟史研究。[51]而 1987 年於臺北出版的《明清經濟史研究》一書中，則指出明清以來輸入大量白銀，卻不進口機器等資本財，是中國工業發展落後的原因之一。[52]亦即他所關注的明清白銀流入問題，不僅和他的貨幣經濟與物價史研究有關，也關係到他的中國工業化研究。易言之，在長達六十多年的學術生涯中，全先生最關注的議題，雖然因時因地而有所改變，卻依然可見其延續性。

輯》（北京：科學出版社，1955），36，表 29。

50 其實，在這三角貿易之中，亞洲市場成為以英國資本主義為主的世界市場之一環。而當時英國重要近代工業商品棉布，卻以有毒商品——鴉片——的貿易為必要條件，才能開拓印度市場 ，因為可以增加種植罌粟並出口鴉片的印度農民對棉布的購買力，而且罌粟種植亦有助於印度財政收入。

51 梁庚堯，〈歷史未停滯：從中國社會史分期論爭看全漢昇的唐宋經濟史研究〉，《臺大歷史學報》35 期，51。

52 事實上，十九世紀初期以後，中國白銀已經因為鴉片的大量進口而開始流出，鴉片戰爭以後中國的貿易收支中，除了 1872~1876 年以外，中國一直是大幅度的貿易赤字，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對香港和印度（兩者皆為英國殖民地）的貿易入超。故雖然在 1885 年以前，中國維持著對英、美、俄、歐陸等先進國家的多量出超，但仍無法彌補鴉片貿易所導致的赤字。參見陳慈玉，〈以中印英三角貿易為基軸探討十九世紀中國的對外貿易〉，收入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編輯委員會主編，《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即今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1984），第一輯，131~173。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五、結語

全先生的研究課題所跨越的時間，自漢代而迄抗戰前夕，可謂淵遠流長，據初步統計其出版品，共有專著 9 種、論文 115 篇、書評 10 篇，以及雜著 5 篇，其內容有專精者，亦不乏博通之類。[53]已故哈佛大學楊聯陞教授曾經題詩稱譽全先生：「妙年唐宋追中古，壯歲明清邁等倫；經濟史壇推祭酒，雄才碩學兩超群」，[54]可以說具體而微地勾勒了他在學術上的重要貢獻。

全先生自北京大學畢業以後，終身服務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他剛進史語所時，只知遵照傅斯年先生的「閉門讀書」的指示，卻因此養成習慣，「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55]找資料和寫論文成為他一生中的工作與興趣。或許因為不善於言辭表達，除非必要，他很少開口；然而卻先後在南京中央大學、臺灣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和新亞研究所講授了五十載的中國經濟史，也曾在南京中央大學和臺灣大學經濟系教授西洋經濟史，[56]培育了不少人才。他上課時常用一些有趣的名言，例如以「月明橋上看神仙」，描寫江南的繁華，使學生留下深刻的印象。[57]1980 年他更應日本基金會之邀，前往東洋文庫、東京大學和京都大學講學半年。[58]戰後六十多年來，臺灣政治環境較安定，從廢

53 何漢威，〈全漢昇與中國經濟史研究〉，《中國經濟史研究》2002 年 3 期，148。

54 何漢威，〈代序：經濟史壇祭酒全漢昇先生傳略〉，《薪火集：傳統與近代變遷中的中國經濟》，IV。

55 這是傅先生當時要學生認真蒐讀史料的教誨，引導全先生的務實求真的治學態度。見黎志剛、林桑祿訪問，〈全漢昇院士〉，《漢學研究通訊》5 卷 1 期，12~15；李木妙，〈全漢昇〉，《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2 期，53~68。

56 全漢昇，〈回首來時路〉，《古今論衡》1，83；陳慈玉、莫寄屏訪問，陳南之、蔡淑瑄、潘淑芬紀錄，《蔣碩傑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60；何漢威，〈代序：經濟史壇祭酒全漢昇先生傳略〉，《薪火集：傳統與近代變遷中的中國經濟》，II。

57 孫震，《回首向來蕭瑟處》（臺北：天下文化，1998），54、60。

58 嚴耕望先生認為日本學人研究中國史，成績以經濟史等三數領域最為顯著，而較早期國人在經濟史方面堪與日本學界相抗衡者，或僅全先生一人而已。嚴耕望，《治史經驗談》

國家圖書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壚中一躍而為經濟大國，研究經費與設備較充裕，與國外的溝通也很容易；中國大陸的研究條件也大大地改善。現今中國經濟史研究的面貌，與全先生拓荒時已不能同日而語，但毫無疑問的，他在這一領域所灌注的心血，是我們晚輩望塵莫及的。

*筆者由衷地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的寶貴意見，也對編輯委員會的辛勞謹致謝忱。

（責任編輯：陳中禹　校對：陳昶安）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1），74。又，全先生在日本東洋文庫發現了《馬禮遜小冊》（*Morrison Pamphlets*），利用它寫成〈從馬禮遜小冊子談到清末漢陽鐵廠〉，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清季自強運動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8），下冊，707~723。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附錄　全漢昇先生著作目錄[59]

一、專書

1934　《中國行會制度史》，上海：新生命書局，1934；影印本，臺北：食貨出版社，1978，12+218 頁。

1944　《唐宋帝國與運河》#，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 24，重慶：商務印書館，1944；重排版，臺北，1995，126 頁。

1954　《臺灣之城市與工業》（與 Arthur F. Raper、陳紹馨等合著），臺北：臺灣大學，1954，xii+318 頁。此書以中、英兩種文字刊行；英文書名：*Urban and Industrial Taiwan, Crowded and Resourceful*, xii+ 370pp.

1972　《漢冶萍公司史略》，香港：香港中文大學，1972，ii+339 頁。

《中國經濟史論叢》，香港：新亞研究所，1972，815 頁；影印本，臺北：稻鄉出版社，1992；稻禾出版社，1996。包括論文、書評 33 篇，詳見著作目錄。

1975　*Mid-Ch'ing Rice Markets and Trade: An Essay in Price History* (co-authored Richard A. Kraus), Cambridge, Mass.: 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 Harvard University, 1975, x+238pp.

1976　《中國經濟史研究》，香港：新亞研究所，1976，上、中、下冊，395+308+316 頁；影印本，臺北：稻鄉出版社，1991，上、下冊。包括論文 21 篇，詳見論文目錄。

1987　《明清經濟史研究》，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7，105+4 頁。

1996　《中國近代經濟史論叢》，臺北：稻禾出版社，1996，505 頁。包括論文、書評 25 篇，詳見著作目錄。

二、論文

1934　〈宋代都市的夜生活〉，《食貨半月刊》1.1（1934）：23-8。

〈中國廟市之史的考察〉，《食貨半月刊》1.2（1934）：28-33。

1935　〈中國佛教寺院的慈善事業〉，《食貨半月刊》1.4（1935）：1-7。

〈中國苦力幫之史的考察〉，《中國經濟》2.1（1935）：1-4。

〈宋代女子職業與生計〉，《食貨半月刊》1.9（1935）：5-10。

〈南宋杭州的外來食料與食法〉，《食貨半月刊》2.2（1935）：42-4。

---

59 〈全漢昇教授著作目錄〉，《薪火集：傳統與近代變遷中的中國經濟》，619~631。書名或篇名後有*者，表示已收入《中國經濟史論叢》，#已收入《中國經濟史研究》，※已收入《中國近代經濟史論叢》。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宋代東京對於杭州都市文明的影響〉，《食貨半月刊》2.3（1935）：31-4。
〈清末的「西學源出中國說」〉，《嶺南學報》4.2（1935）：57-102。
1936 〈清末西洋醫學傳入時國人所持的態度〉，《食貨半月刊》3.12（1936）：43-53。
〈清末反對西化的言論〉，《嶺南學報》5.3,4（1936）：122-66。
〈南宋杭州的消費與外地商品之輸入〉*，《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以下簡稱《史語所集刊》）7.1（1936）：91-119。
〈宋代官吏之私營商業〉#，《史語所集刊》7.2（1936）：199-254。
1939 〈北宋汴梁的輸出入貿易〉*，《史語所集刊》8.2（1939）：189-301。
〈宋代廣州的國內外貿易〉#，《史語所集刊》8.3（1939）：303-56。
〈宋代寺院所經營的工商業〉#，《國立北京大學四十周年紀念論文集》乙編上（昆明，1939），16-22。
1942 〈中古自然經濟〉#，《史語所集刊》10（1942）：75-176。
〈宋末的通貨膨脹及其對於物價的影響〉*，《史語所集刊》10（1942）：201-30。
〈南宋稻米的生產與運銷〉*，《史語所集刊》10（1942）：403-31。
〈秦漢以後的社會是停滯不進的嗎？〉，《文史雜誌》2.5,6（1942）：29-32。以筆名**皮倫**發表。
1944 〈唐代物價的變動〉#，《史語所集刊》11（1944）：101-48。
〈唐宋時代揚州經濟景況的繁榮與衰落〉*，《史語所集刊》11（1944）：149-76。
〈北宋物價的變動〉*，《史語所集刊》11（1944）：337-94。
〈南宋初年物價的大變動〉*，《史語所集刊》11（1944）：395-423。
〈宋金間的走私貿易〉*，《史語所集刊》11（1944）：425-47。
〈元代的紙幣〉*，《史料與史學》上（《史語所集刊》外編之2，1944）：1-57；復載《史語所集刊》15（1948）：1-48。
1947 〈宋代南方的虛市〉*，《史語所集刊》9（1947）：265-74。
1948 〈唐宋政府歲入與貨幣經濟的關係〉#，《史語所集刊》20上（1948）：189-221。
〈清末漢陽鐵廠〉#，《史語所集刊》21（1948）：63-97；復載《社會科學論叢》（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法學院）1（1950），33頁。
1950 〈煤、水力、石油在近代機械動力上的地位〉，《財政經濟月刊》1.1（1950）：48-53。
1951 〈從工業生產觀察英國在世界經濟中之地位的轉變〉，《社會科學論叢》2（1951），24頁。
〈清季的江南製造局〉*，《史語所集刊》23上（1951）：145-59。
〈世界動力資源與世界工業化〉，《財政經濟月刊》1.2（1951）：55-62。
〈近代中美工業化運動的比較〉，《財政經濟月刊》1.3（1951）：39-44。
〈二次大戰前後的遠東經濟〉，《財政經濟月刊》1.4（1951）：44-8。
〈論工業革命〉，《財政經濟月刊》1.5（1951）：59-63。
〈二次大戰前後的日本紡織工業〉，《財政經濟月刊》1.7（1951）：16-2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論落後地區的經濟發展〉，《財政經濟月刊》1.8（1951）：21-4。
〈二次大戰前後東歐與西歐間的貿易〉，《財政經濟月刊》1.9（1951）：47-9。
〈從人口問題談到臺灣的工業化〉，《財政經濟月刊》1.11（1951）：8-13。
〈韓國戰爭與遠東經濟〉，《財政經濟月刊》1.12（1951）：32-5。
〈交通建設在落後地區經濟發展中的地位〉，《財政經濟月刊》2.1（1951）：21-5。

1952 〈二次大戰前後北大西洋兩岸工業生產的變動〉，《學術季刊》（臺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1.1（1952）：146-51。
〈從東南亞經濟談到臺灣經濟〉，《財政經濟月刊》2.2（1952）：3-7。
〈從布價狂漲談到臺灣棉紡織工業的保護〉，《財政經濟月刊》2.4（1952）：9-12。
〈落後地區的外資問題〉，《財政經濟月刊》2.5（1952）：53-6。
〈論西歐鋼鐵煤礦工業聯營的許曼計劃〉，《財政經濟月刊》2.6（1952）：6-9。
〈美國的鋼鐵工業〉，《財政經濟月刊》2.7（1952）：5-9。
〈論臺灣的工業化〉，《財政經濟月刊》2.9（1952）：20-3。
〈美國工業對於外國礦業資源的倚賴〉，《財政經濟月刊》2.11（1952）：37-40。
〈二次大戰後世界動力燃料生產的趨勢〉，《財政經濟月刊》3.1（1952）：38-41。

1953 〈從貨幣制度看中國經濟的發展〉#，《中國文化論集》1（1953）：117-23。
〈清季鐵路建設的資本問題〉#，《社會科學論叢》4（1953），16 頁。
〈論臺灣工業化與對外貿易的關係〉，《財政經濟月刊》3.3（1953）：13-6。

1954 〈清季英國在華勢力範圍與鐵路建設的關係〉#，《社會科學論叢》5（1954）：115-28。
〈清季鐵路的官督商辦制度〉#，《學術季刊》3.2（1954）：63-6。
〈甲午戰爭以前的中國工業化運動〉*，《史語所集刊》25（1954）：59-79。
〈清季西法輸入中國前的煤礦水患問題〉*，《中央研究院院刊》1（1954）：83-9。

1955 〈清季的貨幣問題及其對於工業化的影響〉*，《中央研究院院刊》2 下（1955）：51-60。
〈美國經濟與世界經濟〉，《大陸雜誌》11.11（1955）：28-32。

1956 〈山西煤礦資源與近代中國工業化的關係〉*，《中央研究院院刊》3（1956）：161-85。

1957 〈美洲白銀與十八世紀中國物價革命的關係〉*，《史語所集刊》28 下（1957）：517-50。

1958 〈上海在近代中國工業化中的地位〉*，《史語所集刊》29 下（1958）：461-97。
〈鴉片戰爭前江蘇的棉紡織業〉*，《清華學報》新 1.3（1958）：25-51。

1959 〈清雍正年間（1723-35）的米價〉（與王業鍵合著）*，《史語所集刊》30（1959）：157-85。

1960 〈清中葉以前江浙米價的變動趨勢〉（與王業鍵合著）*，《史語所集刊》外編 4（1960）：351-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鐵路國有問題與辛亥革命〉#，載吳相湘主編，《中國現代史叢刊》1（臺北：正中書局，1960），209-71。

〈漢冶萍公司之史的研究〉#，載吳相湘主編，《中國現代史叢刊》2（臺北：正中書局，1960），277-385。

1961 〈清代人口的變動〉（與王業鍵合著）*，《史語所集刊》32（1961）：139-80。

1962 〈近代四川合江縣物價與工資的變動趨勢〉（與王業鍵合著）*，《史語所集刊》34上（1962）：265-74。

1964 〈略論宋代經濟的進步〉#，《大陸雜誌》28.2（1964）：25-32。

〈從徐潤的房地產經營看光緒九年的經濟恐慌〉*，《史語所集刊》35（1964）：283-300。

1965 〈乾隆十三年的米貴問題〉*，《慶祝李濟先生七十歲論文集》下（1965）：333-52。

〈從西班牙物價革命談到中國物價革命〉，載西班牙研究所編纂，《中國與西班牙文化論集》（臺北：中國文化學院，1965），147-54。

1966 〈美洲發現對於中國農業的影響〉#，《新亞生活雙週刊》8.19（1966）。

1967 〈近代中國的工業化〉#，《新亞生活雙週刊》9.15（1967）。

〈宋明間白銀購買力的變動及其原因〉#，《新亞學報》8.1（1967）：157-86。

〈明代的銀課與銀產額〉#，《新亞書院學術年刊》9（1967）：245-67。

1968 〈明季中國與菲律賓間的貿易〉*，《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以下簡稱《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1（1968）：27-49。

1969 〈明清間美洲白銀的輸入中國〉*，《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2.1（1969）：59-80。

〈清朝中葉蘇州的米糧貿易〉*，《史語所集刊》39下（1969）：71-86。

1970 〈明代北邊米糧價格的變動〉#，《新亞學報》9.2（1970）：49-96。

1971 〈自宋至明政府歲出入中錢銀比例的變動〉*，《史語所集刊》42.3（1971）：391-403。

〈自明季至清中葉西屬美洲的中國絲貨貿易〉*，《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4.2（1971）：345-69。

1972 〈明中葉後太倉歲入銀兩的研究〉（與李龍華合著）※，《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5.1（1972）：123-57。

〈明代中葉後澳門的海外貿易〉※，《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5.1（1972）：245-73。

1973 〈明代中葉後太倉歲出銀兩的研究〉（與李龍華合著）※，《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6.10（1973）：169-244。

1974 〈清代雲南銅礦工業〉※，《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7.1（1974）：155-82。

〈明清時代雲南的銀課與銀產額〉#，《新亞學報》11上（1974）：61-88。

1975 "The Chinese Silk Trade with Spanish America from the Late Ming to the Mid-Ch'ing Period", in Laurence G. Thompson, ed., *Studia Asiatica: Essays in Felicitation of the Seventy-fifth Anniversary of Professor Ch'en Shou-yi*（CMRASC Occasional Series No.29, San Francisco: Chinese Materials Center, Inc., 1975）, 99-11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976 〈近代早期西班牙人對中菲美貿易的爭論〉※，《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8.1（1976）：71-85。

1978 〈清季的商辦鐵路〉（與何漢威合著）※，《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9.1（1978）：119-72。

1979 "The Economic Crisis in 1883 As Seen in the Failure of Hsu Jun's Real Estate Business in Shanghai", in Chi-ming Hou and Tzong-shian Yu eds., *Conference on Moder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Taipei: Institute of Economics, Academia Sinica, 1979）, 537-42.

〈清康熙年間（1662-1722）江南及附近地區的米價〉※，《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10 上（1979）：63-103。

〈再論明清間美洲白銀的輸入中國〉※，載《陶希聖先生八秩榮慶論文集》（臺北：食貨出版社，1979），164-73。

1980 〈清代蘇州的踹布業〉※，《新亞學報》13（1980）：409-37。

1981 "Trade between China, the Philippines and the Americas during the 16-18th Centuries"，載《中央研究院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1981），849-54。

1982 〈明中葉後中國黃金的輸出貿易〉※，《史語所集刊》53.2（1982）：213-25。

1984 〈明中葉後中日間的絲銀貿易〉※，《史語所集刊》55.4（1984）：635-49。

1986 〈略論新航路發現後的海上絲綢之路〉※，《史語所集刊》57.2（1986）：233-9；又載《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2（1986）：30-7。

〈美洲白銀與明清經濟〉※，《經濟論文》14.2（1986）：35-42。

1987 〈明清間中國絲綢的輸出貿易及其影響〉※，載《國史釋論：陶希聖先生九秩榮慶祝壽論文集》上（臺北：食貨出版社，1987-8），231-7。

1988 〈從馬禮遜小冊子談到清末漢陽鐵廠〉※，載《清季自強運動研討會論文集》下（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8），707-23。

〈略論明清之際橫越太平洋的絲綢之路〉，《歷史月刊》10（1988）：72-80。

〈略論宋代的紙幣〉，載《國際宋史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1988），3-6。

1989 〈略論大唐帝國與運河〉，載《第一屆國際唐代學術會議論文集》（臺北：中華民國唐代研究學者聯誼會，1989），1-6。

〈略論十七八世紀的中荷貿易〉※，《史語所集刊》60.1（1989）：123-9。

〈三論明清間美洲白銀的輸入中國〉※，載《中央研究院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明清與近代史組》上（臺北：中央研究院，1989），83-94。

"The Import of American Silver into China during the 16th-18th Centuries"，載《第二次中國近代經濟史會議》（臺北：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1989），23-7。

1991 〈從山西煤礦資源談到近代中國的工業化〉※，載《中國現代化論文集》（臺北：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399-403。

〈美洲白銀與明清間中國海外貿易的關係〉※，《新亞學報》16上（1991）：1-22。

1993 〈再論十七八世紀的中荷貿易〉※，《史語所集刊》63.1（1993）：33-66。

〈略談近代早期中菲美貿易史料：《菲律賓群島》——以美洲白銀與中國絲綢貿易為例〉※，《史語所集刊》64.1（1993）：223-9。

〈略論新航路發現後的中國海外貿易〉※，載《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5（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1993），1-16。

1994 〈鴉片戰爭前的中英茶葉貿易〉※，《新亞學報》17（1994）：237-55。

1995 〈明清間美洲白銀輸入中國的估計〉※，《史語所集刊》66.3（1995）：679-93。

三、書評

1944 〈評陶希聖、武仙卿著，《南北朝經濟史》〉，《文史雜誌》4.5,6（1944）：52-6。以筆名**皮倫**發表。

1947 "Review of Lien-sheng Yang, *Notes on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Chin Dynasty*,"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II. 1(1947): 98-100.

1954 "Review of John King Fairbank, *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 The Opening of the Treaty Ports 1842-1854*," *Bulletin of the Chinese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II. 1(1954):1-3.

1956 "Review of Ssu-yü Teng and John K. Fairbank, *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 A Documentary Survey, 1839-1923*,"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VI.1(1956):100-2.

1957 〈評普利白蘭克（Edwin G. Pulleyblank）：安祿山叛亂之背景（*The Background of the Rebellion of An Lu-shan*）〉*，《清華學報》新1. 2（1957）：265-8。

1965 〈評費慰愷（Albert Feuerwerker）：中國早期工業化：盛宣懷與官督商辦企業（*China's Early Industrialization*）〉*，《清華學報》新5.1（1965）：142-6。

1966 〈評崔維澤（D. C. Twitchett）教授對於唐代財政史的研究〉*，《史語所集刊》36下（1966）：427-34。

"Review of W. Allyn Ricket, *Kuan-Tzu: A Repository of Early Chinese Thought*,"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Royal Asiatic Society* 6 (1966)：138-40.

1969 〈評楊聯陞：從經濟方面看中國在統一帝國時代的公共工程〉*，《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2.1（1969）：246-9。

1973 〈評 Dwight H. Perkins,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1368-1968*〉※，《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6.1（1973）：347-5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四、其他

1935 〈「鬼市子」與「黑市」〉,《食貨半月刊》1.8（1935）：17。

1971 〈移植美洲的中國理髮師〉，《食貨月刊》復刊 1.3（1971）：176。
〈全漢昇教授來信〉，《食貨月刊》復刊 1.5（1971）：342。

1973 〈第二十九屆國際東方學人會議概述〉,《中國學人》（香港：新亞研究所）5(1973)：257-64。

1998 〈回首來時路〉，載《新學術之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紀念文集》（臺北，1998），487-94；又見《古今論衡》（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1998）：81-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引用書目

一、中文論著（全漢昇論著見本文附錄）

王業鍵，〈全漢昇在中國經濟史研究上的重要貢獻〉，原刊登於《食貨》月刊復刊 14 卷 11、12 期，1985，臺北。修訂版收入全漢昇教授九秩榮慶祝壽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薪火集：傳統與近代變遷中的中國經濟：全漢昇教授九秩榮慶祝壽論文集》。臺北：稻鄉出版社，2001。

何漢威，〈代序：經濟史壇祭酒全漢昇先生傳略〉，收入全漢昇教授九秩榮慶祝壽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薪火集：傳統與近代變遷中的中國經濟：全漢昇教授九秩榮慶祝壽論文集》。臺北：稻鄉出版社，2001。

何漢威，〈全漢昇與中國經濟史研究〉，《中國經濟史研究》2002 年 3 期，北京。

何漢威，〈全漢昇先生事略〉，《香港中國近代史學報》2 期，2004，香港。

李木妙，〈全漢昇〉，《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2 期，1986，臺北。

孫　震，《回首向來蕭瑟處》。臺北：天下文化，1998。

梁庚堯，〈歷史未停滯：從中國社會史分期論爭看全漢昇的唐宋經濟史研究〉，《臺大歷史學報》35 期，2005，臺北。

陳存恭、陳仲玉、任育德訪問，任育德紀錄，《石璋如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

陳慈玉，〈以中印英三角貿易為基軸探討十九世紀中國的對外貿易〉，收入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編輯委員會主編，《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一輯。臺北：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即今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1984。

陳慈玉、莫寄屏訪問，陳南之、蔡淑瑄、潘淑芬紀錄，《蔣碩傑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

黎志剛、林桑祿訪問，〈全漢昇院士〉，《漢學研究通訊》5 卷 1 期，1986，臺北。

嚴中平編，《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北京：科學出版社，1955。

嚴耕望，《治史經驗談》。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1。

二、外文論著

〔日〕內田星美，〈技術移轉〉，收入〔日〕西川俊作、阿部武司編，《產業化の時代》，上冊。東京：岩波書店，1990。

〔日〕田中正俊，〈舊中國社會の解體と西歐資本主義〉，《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序說》。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3。

〔日〕波多野善大，〈中國輸出茶の生產構造——アヘン戰爭前における——〉，《中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近代手工業史の研究》。京都：東洋史研究會，1961。

〔日〕福井憲彥，《ヨーロッパ近代の社会史：工業化と国民形成》。東京：岩波書店，2005。

Chuan, Han-sheng and Richard A. Kraus. *Mid-Ch'ing Rice Markets and Trade: An Essay in Price History.* Cambridge, Mass.: 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 Harvard University, 1975.

Gershenkron, Alexander. *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Harvard Univ. Press, 1962.

Greenberg, M. *British Trade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1800-4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1951.

Hoh-Cheung & Lorna H. Mui. "The Commutation Act and the Tea Trade in Britai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16, No.2. 1963, Oxford.

J. M. Gaillard / A. Lespagnol. *Les mutations économiques et sociales au XIXe siècle, 1780-1880.* Nathan, Paris: Nathan université, 1984.

Milburn, W. *Oriental Commerce.* London: Black, Parry & Co., 1813.

Pritchard, E. H. "Anglo-Chinese Relations during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University of Illinois Studie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Vol. 17, Nos. 1-2, 1929, Urbana.

Pritchard, E. H. "The Crucial Years of Early Anglo-Chinese Relations 1750-1800," *Research Studies of the State College of Washington*, Vol. 4, Nos. 3-4. Washington: Pullman, 1936.

Staunton, George B. *An Authentic Account of an Embassy from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 to the Emperor of China.* London: Nicol, 1798. Vol. 3.

Usher, A. P. "The Resource Requirements of an Industrial Economy,"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Supplement VII, 1947, Wilmington.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Chuan Han-sheng: Pioneer Thinker of Moder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and Globalization

Chen, Tsu-yu*

Abstract

Mr. Chuan Han-sheng (全漢昇) was dedicated to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research for more than sixty years. He was a highly respected scholar in this field. Since the 1930's, he researched original historical records, attacked new problems, and pioneered new fields; at the same time he also studied and applied the new knowledge and concepts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to Chinese history. In addition to serving as a research fellow at Academia Sinica, he was a prominent professor at several universities and taught many students.

He emphasized different topics during his academic career. In early age (before 1949) in mainland China, he concentrated on the early period of Chinese economic development, from about 300 AD to 1200 AD. Afterwards, when he was in Taiwan (1949~1965) and Hong Kong (1965~1995), most of Mr. Chuan's effort was on the Ming and Ch'ing dynasties' economic history. His fields of interest included: treasury, price, finance, economic organization, transportation, domestic commerce,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dustry modernization. Earl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 China, there were various approaches to diagnosing social and economic problems. Many scholars tried to promote Marx's theory to achieve social justice and economic improvement. Mr. Chuan disputed their thinking and argued, from the lessons of Chinese history, that that approach would only sustain the social and economical stagnation of China. His academic achievements on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dustrialization reflected o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under globali- zation. In today's terminology, he was really a pioneer of thinking about economic globalization.

Keywords: Chuan Han-sheng (全漢昇),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international trade, industrialization, economic globalization.

* Research Fellow of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